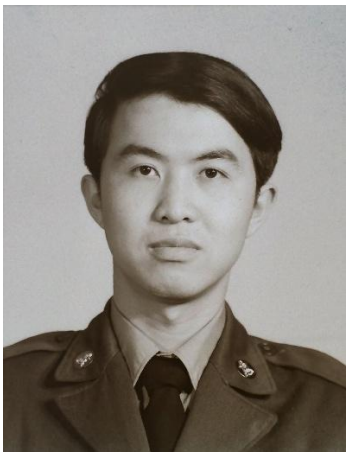
# 我的當兵奇遇

姚開陽



早年在台灣只要是正常男性，幾乎沒有人沒服過兵役，男人只要聚在一起就是吹噓自己的當兵經驗，讓一旁的女生覺得很沒趣。

兩岸開放往來後，大陸人對台灣人的「軍事經驗」也很感興趣，這才發現原來他們有很多人沒當過兵。事實上在大陸當兵得爭取而且要成份好，並不是人人都有機會。

1975 年蔣介石去世，同一年我大學畢業，與當時大部份的男生一樣，得先把兵役服完再來談踏入社會就業或是出國深造。我在校時對考預備軍官就沒多大興趣，而且我很清楚如果是服義務役當官比當兵辛苦又不容易調輕鬆差事，所以最後沒考上預官，等著畢業後去當大頭兵。

畢業後不久就被通知體檢與抽籤，有一天忽然接到市公所通知我已甄選為政戰士，原來抽的籤可不予理會，直接到北投復興崗報到接受一個月的集訓。當時一頭霧水，後來才搞明白，原來政戰士的職務從前在軍中是少尉幹事，因軍官員額縮減而改為士官編制，我們是第一屆。

為了帶領這群有史以來第一批的政戰士，政戰學校將應屆畢業的 21 期學生留下一部份來當區隊長，其中就有後來以演包青天而聞名的金超群。我之所以記憶猶新，是因為這位金區隊長很愛擺官威，而且不看時間地點。有次總政戰部主任王昇上將來校與同學會餐，總值星官已經號令全場起立恭迎，金超群還在台下大聲斥責他區隊裡的學員，全場為之側目，長官只好跑來叫他安靜。

這群留校的區隊長沒有像其他同屆畢業生分發部隊，等到半年之後要分發時已經無缺，當時政戰與憲兵有所謂的「軍政交流」，於是大部份都撥給憲兵，30 幾個人全部送往憲兵學校接受職前訓練。剛好那時我已派到憲校以政戰士兼任政

二新聞官，負責協調那一班隊的事，雙方主客異位，一票當年威風凜凜的區隊長現在全成了我的學員，見面好不尷尬。

政戰學校結訓前的抽籤分發有如大樂透開獎，是天下一等刺激的事。由於政戰兵科面對全國陸海空勤警所有部隊的需求，而當時的國軍體制還很龐大，一千五百個人抽全台灣與外島的部隊，什麼稀奇古怪的單位都有，譬如「軍犬隊」、「軍樂隊」、「國劇隊」、「后里馬場」、「綠島軍監」…等，聽說還有「國外」籤的，不過我沒見過。當然所有人都怕抽到「海軍陸戰隊」，但還有比那更恐怖的，像我的前一個抽到「政戰特遣隊」，後一個抽到「反共救國軍」，半年後在一個場合巧遇，只見他皮膚黝黑，胸前跳傘徽、臂上骷髏頭，和我們好像完全是兩個不同世界的人了。

主持的軍官一看我抽出的籤馬上笑臉說：「這真是一等一的涼籤，憲兵學校勤務隊！」原來當時的憲兵是特權兵種，還有舊日「特高課」的遺風，見官大三級，看電影不用錢；其次憲兵單位 90%機率在本島、50%機會在台北，如果分到金馬獎那真是和被雷打到的機率差不多；而且勤務隊是後勤單位任務輕鬆，躲在幕後上級比較不會注意。我發現每一個同學都對我投以羨慕的眼光。

政戰學校結訓後由憲兵司令部接回分發到憲兵部隊的政戰士約 40 人左右，回到憲兵司令部內再受一週的職前講習。當時的憲兵司令部位在台灣大學旁，營區現在已經變成辛亥路的一部份，這裡對剛離開文學校的我們感覺有如天堂，因為與校園、夜市、大馬路就一牆之隔，雞犬相聞，完全沒有身在軍中的感覺。

一週後結訓，憲兵學校派來小吉普接我去五股校區報到，原來只有我一人，專車享受沿途軍憲警崗哨敬禮的待遇，真是受寵若驚。到了憲校勤務隊，除了一個當值的預官區隊長正在睡午覺外，所有長官都不見人影，原來當天是週六，都下班回家了，區隊長也不知應如何處理，就說那你行李放著也回家吧。這就是我下部隊的第一天，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憑空混到兩天假。

憲校勤務隊有兩名預官區隊長，他們自定的上班方式很奇特，一個在營值星，另一個在家休息，如此輪替，這真是令我大開眼界，原來兵還可以這麼當的。他們都畢業自不錯的大學，與我保持很好的關係直到退伍後。至於更上級的長官是

少校隊長與上尉輔導長，都是老士官出身，江湖味十分重，感覺上和「刑事的」差不多。

勤務隊由三種不同的群體組成，一個比一個難管。第一種是伙房水電木匠汽車修理養豬傳令等各種雜勤兵，無論是充員兵或是老士官都是程度很差、生活鬆散、軍容不整的烏合之眾。其次是戰技班助教，專門教跆拳柔道的教練，他們全都是士校畢業，個個兇神惡煞，而且是最不守紀律的一群，很多都是原住民，其中一位就是前紅葉少棒隊的當家投手胡武漢。第三種人更絕，是校部 辦公室所有的女性雇員，多達十餘人，她們既不是軍人也無法軍事化管理，鶯鶯燕燕嘰嘰喳喳，人多勢眾還敢吃你豆腐。

這樣的官員兵組合不出問題也難，後來果然一個伙房兵在發生嚴重的軍紀問題後被校方長官下令送往台北憲兵隊關押，由我負責押送。這是我第一次到這種地方，地點就在中華路憲兵隊的地下室，型式和抗日電影中所見的日軍牢房差不多，屋頂懸吊一盞搖搖晃晃的白熱燈泡，通道中央還有憲兵端長槍監視。其中有一間關著當年隧道口衛兵奪槍案中被搶的憲兵，他的牢房門上掛著一個牌子註明「防止自殺」！

我因此認識了台北憲兵隊專門負責槍斃人犯的隊員。戒嚴時代結夥搶劫根據軍法是唯一死刑，那一年達到高峰，在我送人去關押的前一個月就連續槍斃了三批，每一批約三、四個人，全都由台北憲兵隊執行，我在那兒聽了很多當時不能外傳的故事。

勤務隊的管理不良，最明顯呈現在「吃」的上面。憲兵學校的伙食差到難以想像的程度，譬如胡蘿蔔與馬鈴蜀是從來不削皮的，當時私下流行一據話叫做「憲兵鐵胃」！注意是胃腸的「胃」而不是保衛的「衛」！

說到軍營生活，剛到憲校每晚睡覺都聽到圍牆外潺潺溪水聲，覺得這地方還真是不錯，隔了一週後開始瞭解校外狀況，才發現所謂的溪水聲原來是隔鄰紡織廠運轉的機械聲，大煞風景，從此覺得這地方真是難過。憲兵學校雖然在五股的山角下，但與三重、新莊一樣到處都是工廠與污染，實在不是個好地方。

勤務隊沒待上兩個月，校方政戰部主任調我去頂替政二新聞官，這個職務被裁掉以前是上尉編階，至於原勤務隊的工作應該怎麼辦主任沒多講，這成了我和輔導長之間的矛盾。不過我到政戰部後正好管到他的考核，他也不敢對我怎麼樣，雙方關係十分微妙。

我能考核自己的輔導長絕不誇張，事實上只要是與文宣有關的事我就能考核全校各班隊單位。有一次某隊壁報比賽參與不力，我簽擬記該隊中校隊長(他的老爸是當時的國安局局長)小過一枚，最後公文由主任核准發佈，從此人人巴結我。這也是當年不正常的人事調動造成奇特的權力結構，以後我從未聽過有類似的情形。

不過被我記小過的那名中校隊長一點也不冤枉，因為在他們隊上做的壁報上面，青天白日旗竟然變成了紅天白日，而且從製作到展出竟然都沒有人發現，在當時的政治環境我若是無限上綱，肯定要有人頭落地的，記個小過算是非常便宜的了。

由於我成為校本部軍官團的一員，雖然是黑官，但享受上下班的特權也不太有人會講話。要是一般人有這個機會一定每天回家，但是我一向不太愛住在家裡，所以想在外面找房子，但付房租對當兵的收入來講還是一筆不小的開銷，由於憲兵學校剛好就在我母校輔仁大學的後門，所以我把主意打到了輔大的男生宿舍。

各位不要以為這是天方夜譚，我還真的差一點就搬進了輔大文學院的宿舍。因為我在校時就與舍監老汪混的很熟，剛好他原來就是憲兵學校的中校教官，有這麼多層關係再加上軟磨硬泡居然獲得首肯。我之所以後來沒有搬去住，原因是我發現了一個不要錢的地方。

輔大後門有一家名為波西米亞的西餐廳，當時由一個夜間部的學生頂下來經營，他由於晚上需要上課，希望找個人來幫他照顧夜間的營業，條件是可以免費吃住，雙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我就搬進西餐廳的樓上，每天下班由五股憲校騎自行車回來看店，順便憑軍人身份到軍公教福利品中心買些柴米油鹽當餐廳的材料。

如此過了一個學期，那位夜間部的學生突然不想經營了，這表示我也即將失去免費的住所。幾經商討，決定由我頂下來繼續開業，憲兵學校的區隊長們也加入插股，我找了兩名夜間部的女生白天看店，如此直到退伍。這大概是中華民國兵役史上極為罕見的例子吧。

早年憲兵是有特權的，由於西安事變的歷史原因，蔣介石對憲兵是相當的信任，所謂「領袖的鐵衛」。不過等到我當兵時蔣介石剛好去世，蔣經國較信任政戰與警官系統，憲兵的勢力這時已經被削弱，譬如以前我們在全台灣看電影都不用買票，後來限縮到三重新莊地區不用錢。

但總的來說在戒嚴時代，憲兵比警察大，這我有實際的體驗。由於憲校的幾個預官經常晚上穿著軍服在我的咖啡廳進出甚至夜宿，引起鄰居懷疑以為有逃兵而告到派出所，某天午夜當所有人都就寢時警察大舉來臨檢，一看到我們的服務證連問都不多問，當即道歉退出。我想他們是否以為這裡是憲兵調查站的秘密據點也說不定呢。

我很善於利用憲警之間的默契，譬如早年在家中開舞會都得偷偷摸摸，因為警察會來取締，更別說公然營業。波西米亞卻是個特例，每天晚餐時間結束後就把場地租予輔大的學生開舞會，利潤比賣餐高得多。學生也不是傻子，他們知道來這兒跳舞有人罩警察不會抓。所以我經營波西米亞一年多不但解決了自己吃住的問題，還小賺第一桶金。

憲兵是國防部的直轄單位，而憲兵學校又是憲兵司令部的直轄單位，規模雖小，位階卻很高，我經常收到國防部抄送全軍的公文，雖然內容可能無足輕重，但發文對象卻把全台灣師級以上單位的部隊番號與駐地顯示的清清楚楚，無意間成了重大的洩密管道。

每年五月我都有一項重要的任務要處理，就是安排軍校生巡迴全台各高中職校的宣傳活動，主要目的是吸引高中職畢業生投考軍校。任務結束後國防部在三軍軍官俱樂部召開慶功宴，由於對象是各校承辦人，主任沒多思索就派我參加。我到現場發現與會的至少都是中校以上軍官，將軍都有好幾個，全場只有我一個士官，連在門口開車門的階級都比我高。進場就座的前一刻突然看到班隊的中校

輔導長匆匆趕來，他說主任事後想想不對，臨時通知他來代替我，避免了一場尷尬。

早年各單位的新聞官照例兼任軍聞社的通訊員，我們的主任特別愛搞媒體公關，所以我經常有機會到信義路黎明大樓送新聞稿。我常在重點段落前以星號來標示，相信很多人都有此習慣，有一次卻被軍聞社的編輯嚴重警告，原來連這個都可以扯上思想問題，當時的政治氣氛可見一般。

新聞官還要負責學校活動的攝影，包括長官來視察，所以我跟拍過不知多少個上將總司令。當時台灣還有較多的國際關係，有一次政戰學校遠朋班來訪，全都是中南美州的學員，主任還特別從大專預士班選拔西班牙文系畢業的學兵負責接待。我記得這些中南美來的學員中有穿著與長相都像極納粹的阿根廷軍官，也有長的像菲律賓原住民的中美洲軍官，還有一個超級性感漂亮的巴拉圭女軍官。以及一個身材粗壯，臉像橘子皮的巴拿馬軍官，後來才知道他就是諾瑞加。

話說憲兵已經是國軍的內衛，監視憲兵的政戰更是內衛中的核心。當時有人私下講老共若打過來，幹過憲兵的一定都沒命，如果是憲兵的政戰那恐怕更要被扒皮了，我就是憲兵的政戰，在憲校除了前述工作還要負責收繳「匪偽傳單」與查禁「反動書刊」。講到匪偽傳單，當時新莊、五股地區還真的有發現，有人說是空飄來的，我十分懷疑，怎麼可能從對岸飄到台北縣？應該是有人散發的。不管它怎麼來的，所有學員生撿到都要送來我這兒報繳。至於查禁反動書刊則是利用學生上課出操機會搜查營房，我的經驗中真正的「反動書刊」沒搜到過一本，色情書刊倒是繳獲不少。

在憲兵學校如果不是主官，連上校都沒有專屬辦公室，但我卻是例外，我在圖書館佔有一研究室做為工作室，那間研究室藏有許多教案，都是當時還屬極機密的重大政治案件譬如：「二二八事件」、「四六學潮」、「崔小萍案」、「李荊蓀案」等，沒事就拿幾本來看。80 年代社會開始鬆動，媒體競相挖掘早年的政治案件，但因缺乏資料語多臆測，當時我也兼差幫同學的政論雜誌寫文章，我寫的就具體的多，許多人以為我有什麼特殊管道，實際上就是早年在憲校圖書館研究室內看教案的結果。

幹地下新聞官約一年後政五康樂官調校外受訓，主任看我還游刃有餘，竟要我再兼政五。這是個少校的職缺，負責康樂與福利，福利我搞不來讓別人兼理，但康樂捨我其誰，譬如每個月的電影欣賞會，於是我又到西門町找片商談租影片與放映機材，還自己畫電影海報。我畫的電影海報有戲院看板的水平，常常掛後不翼而飛被人收藏。

調到政戰部快一年時，適逢三軍七校合唱比賽開打。由於憲校沒有四年大學制學生素質較差，人數與可獲得的資源也相對較少，所以過去一向敬陪末座。但我們的主任一心想升將官，對這種事特別熱中，他從正在憲兵訓練中心受入伍訓的大專預備士官班中挑選在校有合唱團經驗的學兵約 50 人到憲校集訓一個月，並透過關係請政戰學校音樂系的白玉光來指導。

我被主任指派為合唱團經理，除了行政協調事務，還要負責抄譜印譜與製作歌詞幻燈片，在沒有電腦的時代這可是非常需要專業技術的。我用刻鋼板蠟紙來繪譜，用油印機印譜；用高反差黑白底片拍字幕，自己在暗房顯影再用色光染底色。由於我學過音樂，有時還要擔任助教甚至兼任練習時的鋼琴伴奏。我的十項全能讓校部所有的軍官都看的目瞪口呆。

比賽結果政戰學校第一名，憲兵學校第二名。這時代表主辦方的總政戰部副主任廖祖述中將說話了，他認為政戰學校有音樂系，與一般軍校同台競爭並不公平，應另頒特別獎。這個意思就是：冠軍杯這一回落在憲兵學校的手中啦！三軍官校聽到這一結果大嘩，因為過去他們一向輕視憲校，無法想像會被憲校擊敗，紛紛提出異議，但在聽了現場錄音帶後就沒話講了。

合唱比賽大獲成功，憲兵司令部政戰主任覺得幻燈片字幕是個不錯的點子，打算用在即將到來的全軍康樂隊大賽，於是一聲令下又把我暫借到憲光藝工隊支援。和之前一樣，沒有公文只有口頭命令，於是我又多兼了一個黑官。憲光藝工隊位於新南營房，地點就在今天的大安森林公園，迎接我的是一個粗粗胖胖的人，自我介紹叫俞凱爾。

有誰看過名電視製作人俞凱爾在台上表演歌舞的？我就是一個。當時憲兵藝工隊排練了一齣歌舞劇，由於人手有限，每一個人都要上場，劇中需要一個扮演

魚肉百姓的「萬惡共匪」，看起來俞凱爾的形象最接近，於是他上台又唱又跳，最後還被村民們亂棒打死。雖然很八股，但當時康樂隊的節目多半都是這樣。

我根據節目製作了一套幻燈片配合他們去參加比賽，可惜康樂隊大賽比的是歌舞表演，幻燈片幫不了什麼大忙，最後落敗。本來俞凱爾希望我留在藝工隊，我也有點動心，但競賽沒獲勝講話底氣就不足，只好再回到憲校。

你要問我在憲校一年多留下些什麼沒有？有的！在憲校山頂正面有一整排規模還不小的廁所至今尚存，那是我與區隊長留下的成績。這位預官區隊長是建築系畢業的，被校方指派設計與監造這棟廁所，我因常與他討論建築話題，也一起參與。當時沒想那麼多，反正我們就把它蓋起來了，而且到今天都還沒倒塌，至於建照嘛，八成是沒有的。我只是搞不清楚校方當時怎麼會想把廁所蓋在校部大樓的頭頂上，這樣風水不是不好嗎？

這位學建築的區隊長退伍後留美，後來幹到著名的 NBBJ 建築師事務所的資深副總裁，有一天突然自美國發來電郵找我，希望幫他們事務所向北京奧運主場館的競圖提案寫設計論述，我這才知道原來世界級的事務所也是先射箭再畫靶的，當即「望圖生義」草就一篇「平天冠與四方來朝」交差，可惜平天冠在最後一輪敗給了鳥巢。

快退伍前軍官團打靶問我要不要去玩玩，我想包括政戰學校受訓近兩年來都沒碰過槍，更不用說射擊，既然快退伍了，那就保持這個紀錄吧。所以我當兵 22 個月真的沒摸過槍、沒戴過鋼盔與著過任何裝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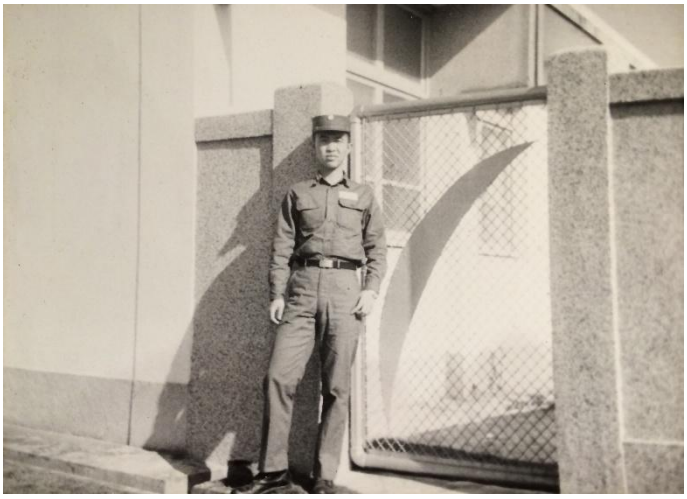
雖然我不像是在當兵，但工作績效卻是很好的，在服役期間總共累積記了兩小功、兩嘉獎，差一個嘉獎就能獲得勳標。由於我在憲兵學校的表現產生了兩個影響，第一是校本部的那些老上校們大概覺得我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竟然串聯起來向我遊說志願留營。這些人真是太不食人間煙火了，我怎麼可能在這兒繼續幹下去呢？就算我是預官都不可能答應了何況我還只是一個下士！其次他們以為所有的政戰士應該都像我一樣十八般武藝全能非常好用，等到第二屆我的接任人報到後發現怎麼差那麼多？這是我退伍之後才聽說的。有趣的是他們為了留住

我還使出美人計要介紹女朋友給我，我還真的盛情難卻到他們眷村的家中吃過飯相過親呢，但只要提到留營，那就一切免談！

退伍當天我早上到辦公室向單位告別，下午就到民間公司報到，一天都沒有浪費。事實上那家公司等了我一個月，因為我應徵時他們以為我已經退伍了，錄用之後才發現搞了烏龍，但大概看我是難得一遇的人才，特別破例將職位空懸一個月等我。

男人退伍後都愛談當兵時有多神勇，真正在部隊數饅頭時卻是一天都不想多待，有「當兵狂」並且真正去實踐的人畢竟不多，我的一位朋友算是其中的奇葩。他自台灣的特戰部隊退伍後到日本留學，80 年代日本社會高度景氣，年輕人都到大商社上班，沒有人想穿二尺半，所以自衛隊缺員嚴重，只好廣開後門讓外籍人士也可以加入。我這位朋友體格棒訓練好經驗夠，馬上可以派上用場，自衛隊對這種人才自是非常的歡迎。所以這位老兄在日本讀書三年，兵也當了三年，而且自衛隊待遇很好，等於留學日本不但不需花錢還可以賺錢。當兵當到日本去，也真算是奇聞了。

以上是我服役一年又十個月的經歷，之前從未形諸文字，因為怕被留做證據讓在校的長官為難，不過現在已經事過境遷卅四年，應該不可能還有人留在憲校了，特地撰寫本文為自己人生的一段奇遇留下紀錄。



成功嶺時代的留影，當時還是圓筒形小帽的年代。

以下再來補充一段與當兵有關的故事。當年我們大一寒假都要上成功嶺受訓，有一天清晨聽到營區擴音器哇啦哇啦通報，要全師官兵在大操場集合，因有一名台大的學生志願轉學到陸軍官校，蔣經國要來慰勉訓話，再仔細聽才發現竟然是我的中學同學林正義。林正義與我從省立宜蘭中學初中部到高中部都同班，而且坐在隔壁，算是蠻熟的。林正義外號「大頭」，人很聰明但思想有點怪怪的，他其實高中沒有畢業，原因是打教官被留校察看，然後以同等學歷考上台大農機系。讓人不解的是，在那種時空背景敢打教官通常都是反抗權威的人，怎麼會自願投入權威教育大本營的陸軍官校？

林正義就是林毅夫，後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本來是國軍刻意培養的明日之星，卻在過水資歷的馬山連長任內叛逃大陸。更奇怪的是他投奔大陸後並不像其他人被當成宣傳樣板終老，反而有機會前往美國深造，成為大陸改革開發經濟政策的一代宗師。對於此我一點都不奇怪，他就是在人生重大轉折時會做出異於常人舉動的那種人。

2002 年林毅夫的父親過世，當時已經執政的民進黨很想利用林毅夫奔喪的機會與其接觸，發展與中國大陸高層的直接連通管道。民進黨一向缺少這種人脈，林毅夫因為宜蘭背景，與許多民進黨大老都是同鄉校友，可謂最佳人選。但國民黨卻吃味了，威脅若林毅夫敢回台就以軍法追訴其敵前逃亡的死罪。問題是 20 年追訴期已過，理論上已不存在這個問題，但國民黨卻強調應以發現林毅夫就是林正義之後開始起算，認為追溯期尚未過。這個爭議的來源是當初國軍為了面子，宣稱是失蹤，並發放家屬撫恤金，但那時軍方真的不知道林是叛逃嗎？這一點我完全不相信，因為叛逃事件發生的當月，我們全班同學就都知道了。